

# 中国道路的本源意义

韩庆祥

## 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奇迹”已引起世人关注,且都试图对“中国奇迹”作出各自解释。西方不少学者往往用“西方标准”“西方理论”“西方范式”解释中国奇迹,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这种解释在世界上影响较大。一些国家的学者在谈论中国奇迹及其原因时,大都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涉及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问题。不能让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更不能用“西方标准”“西方理论”“西方范式”来解释中国奇迹。中国学者应掌握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抓住问题的根本,使解释具有彻底性。在我看来,是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因而要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这里所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可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战略目标的根本支柱;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总体方略;注重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合力。可从这五个方面对中国奇迹作出本源性解释。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能创造中国奇迹。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奇迹”。从总体来讲,在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总体性地位和核心性作用。

确定历史方位且与时俱进就会创造中国奇迹。能对中国历史方位作出准确判断,能找准历史坐标,使我们党时刻保持清醒,能对中国发展阶段、本质特征、实践要求作出科学研判,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正确的事,这可以避免保守、冒进;明确历史方位,就能找准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进而确立工作重点,能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事物特殊矛盾,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点,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地紧跟时代步伐。这也有助于创造中国奇迹。

明确战略目标就会创造中国奇迹。清晰的战略目标不仅具有强大动力作用,能明确人们前进的方向,激发人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其自觉主动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坚定不移地实现战略目标,而且具有强大聚力作用,能凝聚人们最大共识,使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有效的总体方略有助于创造中国奇迹。实现战略目标,正确的路径和方法是关键。正确的“总体方略”能使我们发挥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进而能实现重点突破和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从而使发展具有坚实基础。

整合推动力量必然使中国发生奇迹。推动当代中国发展主要有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这三种力量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形成合力,必然形成一种既强大又平衡的力量,从而使中国发展取得惊人奇迹。

##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也是产生

中国理论的实践基础。由此,我们有理由用这一理论对中国道路作学理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动力机制,是一个社会赖以运动、发展、变化并呈现活力的推动力量,以及由此发挥作用的机理和方式;平衡机制,是一个社会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如何协调,以保持平衡、和谐、有序运行的机理和方式;治理机制,是针对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失衡而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的调整、规制和完善。

中国道路首先要致力于解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动力和活力;其次要致力于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平衡、和谐、稳定的问题;当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失衡的时候,中国道路就必须致力于通过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来解决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失衡的问题。

基于中国道路可以构建中国理论。其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动力机制上,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要注重创新发展,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二是在平衡机制上,它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在治理机制上,它注重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既为发展注入创新动力和活力,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道路和制度要彼此理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讲的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是蕴含着“中国之治”的中国制度。

中国制度与中国道路是什么关系?中国制度是中国道路中的制度维度,是在中国道路开创、拓展和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之制度化,是基于中国道路之上且关于道路的性质、道路的目标、道路目标

的实现方式和道路的推动力量的规则体系。就是说,中国制度是从中国道路中产生和形成的,是立足于中国道路而形成的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在中国道路行走的实践进程中,就其中一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问题而确定的规则体系。因而,中国制度是借助于中国道路而发挥作用的,没有中国道路及其实践,哪来的中国制度,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有,那也是抽象的。道路不同,制度必然不同。因此,从本源意义上,相对于制度,道路逻辑在先。

当然,二者也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首先是解决整个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而一个国家所实行的制度,首先是要解决道路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最根本的制度,首要是关于道路的制度,而最根本的道路,首要是关于制度的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实践支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制度保障。

### 中国道路使中国文化彰显时代价值

中国道路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其中吸纳并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道路在性质和总体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儒家文化占主导。儒家文化相对强调集中、统一,大一统,强调秩序,强调文化为统治阶级服务。对这种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然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这在当代中国道路中就体现为追求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道路又使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得以彰显。文化要古为今用,正是中国道路所创造的世所罕见的中国奇迹,才使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得以彰显。为什么要坚定文化自信?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民为邦本的民本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刚柔相济的坚韧精神、贵和尚中的中道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大局为重

的集体精神、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兼济天下的大同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在当代中国道路中,蕴含着以新的特点和形式彰显出的人民中心的民本精神、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迎难而上的坚韧精神、兼济天下的大同精神、开放创新的包容精神、团结合作的集体精神、命运共同的共生精神。正是这些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使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定道路自信,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滋养着中国道路;坚定文化自信,源于对中国道路的信心,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

在当代中国,不同道路之争,其深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争,而不同文化之争,其底蕴也体现为不同道路之争。中国应“向何处去”?中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每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把这一核心问题提到前台。对道路的选择不同,文化取向也就不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倡导马克思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强调西方文化。

### 用中国方案彰显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

从逻辑上看,“中国方案”缘起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世界化并彰显其世界意义的具体表达;中国方案的背后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它植根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为根本之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方案”的本质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之世界化意义的拓展,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世界化意义的彰显。如果说,“中国理论”是从上层建筑层面对中国道路的理性阐述,那么,“中国方案”则是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层面对中国道路的具体阐释。

“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还可以做出下述阐释。“中国奇迹”引发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道路”得以出场的缘起;对世界来说,中国奇迹的秘密要到中国道路之中去寻求,中国道路是产生中国奇迹的根源所在。在此前提下,以“中国道路”为本源,“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三者又构成一个相对独

立的逻辑系统。在该系统中,“中国道路”是本源,同时也是核心,“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表达。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阐释需要“中国理论”,中国理论是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理性解释。由此可以说,这三者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推展,具有严密逻辑性。

### 基于中国道路构建中国话语

中国道路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实践基础和最充足的现实根据。中国话语是中国道路的理性表达,它在本质、核心上是表达中国道路的。中国道路是中国话语的实践基础、现实载体和本源依托,建构中国话语,应致力于寻求并阐释使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的核心要素、标识要件,这些核心要素、标识要件是构建中国话语的关键。

从宏观上讲,这些核心要素、标识要件主要是:作为“定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定位”的立足历史方位、不断与时俱进;作为“定标”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定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作为“定力”的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中国话语建构,应围绕上述核心要素、标识要件来进行,把这些核心要素作为构建中国话语的标识性范畴。

中国话语自信从根本上源于“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连续三十多年中高速增长,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创造了两大“中国奇迹”。这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

### 意识形态之争深层源于对中国道路的不同解释

意识形态建设要围绕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四个核心问题进行,尤其要围绕对中国道路的学理阐释来进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先要练好“内功”,不练好“内功”,缺乏免疫力,面对“外攻”,我们就会缺乏抵抗力。练好“内功”,增强免疫力,既有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问题,也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外

攻”的抵抗力。

强化“内功”，最关键的，就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要聚焦于中国道路，要围绕解释中国道路进行。“中国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意识形态之争往往是中国道路之争。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误读中国、曲解中国的内容之一，就是认为“中国道路”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内一些错误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不同意义上也持排斥态度，要么崇拜西方新自由主义而走“邪路”，要么妄想回到“文革”的“老路”上去。因此，要回应意识形态挑战，凝聚共识，赢得认同，树立理论上的权威，就必须阐释好中国道路，把中国道路的内涵、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从政治上、理论上讲清楚。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如果只讲意识形态建设而不去研究中国道路，不仅是研究上的短板，也是研究上的不彻底，是浮在空中的表象化研究。

### 中国道路蕴含中华新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中华新文明。这种中华新文明，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再版”，也不是西方文明的直接“翻版”，而是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道路”在当代的生动表达，是中华文明的时代表达，属于新的现代文明形式。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发展的深厚积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决定了中华新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无论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当积极借鉴世界包括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绝不是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而是以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在深入研判中国发展的时代趋势与现实国情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分并纳入中国道路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中华新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性文明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现代性文明的唯一版本。西方现代化发展在取得系列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现代性之殇”，如两极分化、冲突加剧、精神匮乏、信仰失落、私利膨胀等。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危机是我们重构现代文明的契机，也使我们找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方向。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从而取得成功，表明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塑造一种中华新文明。这种中华新文明，既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共生、和而不同、海纳百川、兼济天下、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文明理念，也来自于中西文明优势互补、融合互鉴的发展实践，还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成功经验，更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趋向。其核心要义，是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和而不同、兼济天下、命运共同。世界多样是一种世界观，它反对一元主宰的世界观，是中华新文明的前提；国家平等是一种国家观，它反对国强必霸论的国家观；文明互鉴是一种文明观，它反对文明冲突的文明观；包容发展是一种发展观，它反对“以鞋裁脚”的西方中心论；互利普惠是一种义利观，它反对赢者通吃的单赢观；和而不同是一种包容观，它反对唯我独尊的独断论；兼济天下是一种普惠观，它反对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命运共同是一种共生观，它反对你死我活的丛林观，同时也是中华新文明的落脚点。显然，中国道路超越了“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摒弃了西方文明排他、独断、霸权的思维方式；中国道路把世界各国都纳入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互利普惠的世界框架中，它是对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丰富、完善。

作者简介：韩庆祥，河南孟州人，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原标题《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的“中国道路”》）